

我是口述历史推动者，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。对我来说，2014年可以称为公共历史、尤其是口述历史的启蒙年。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特大成果，但是种子埋下了。众多从事历史记录挖掘的个人、团队，从散落走向聚合。

2014年，我参加了四个会。5月宁波大学的公众史学研讨会，7月上海师范大学的公众史学师资培训班，10月湖南图书馆的图书馆与口述历史研讨会，11月深圳的历史嘉年华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。11月的这次大会，有170多位公共历史、口述历史的参与者参加，绝大部分是免费的。开会不是事儿，但是这么密集的会，在公共历史和口述历史领域那就是事儿了。可以看到，在理论、项目、师资、培训等领域，都在蓄势待发。

经由这些活动，如同发掘文物，我们找到并聚合了数百上千的从事历史记录的同好，得以与他们同向而行。这些都是公共历史和口述历史的种子，可以期待在未来盛开。

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，无疑是历史大年。固然会有一些喧哗，但对于整个领域可能是一次大的推动，让社会和市场认知历史的公共价值和市场潜能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将是更多由势成实，剪短顾长。

一方面，与合作伙伴一起推动和实施更大的口述历史项目，如春秋计划、抗战记忆全球采集计划等，这些项目的周期可能是5-10年，并配套以教材、培训班、项目孵化等培训体系，在大学生、中学生中推广口述历史培训教育。此外，加强同业协作、资源整合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的公共历史进程。同时，我们在文化历史、文化旅游方面执行定制服务项目，成为最靠谱的历史服务提供商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将循序布局历史传播媒体通路，在微信公众号、视频网站、网络电台、网络电视、图书出版、线下空间(杂志客厅)等媒体，构建最有质量的历史传播平台。

历史，从专业角度上讲很窄，但在应用方面可以很宽。路不怕远，行不怕慢，有人同路就好。(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，曾任《看历史》杂志主编)

本人撰稿

我是熊丙奇 一边喊着改革 一边重复老的故事

新春考，这是我国内地高校首次尝试给一名考生发两张录取通知书，也是我认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之一。这一改革进展如何，将对我国高考招考分离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，希望上海能把这一改革做好。

2015年，还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、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启动之年，各地教育部门、学校，能否重视综合素质评价，认真推进课程建设、改革，可从中看到高考改革的成效。

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，我很难对其点赞。先于北大、清华，早有学校颁布章程，可章程颁布后，现实没有任何改变——没人真把章程当回事。我曾反复呼吁，要把章程制定纳入立法程序，可教育部门和高校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颁布章程，这样的章程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，如何能成为依法治校的宪章？

高考改革，被誉为最彻底、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。可美言者忘记了，过去20年来，我国一直在进行高考科目的调整，当年高考科目从6门变为3+x，力度并不比现在小，可结果如何呢？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？应试教育缓解了没？再看录取制度，多年前就有省市推出综合素质评价，号称在录取时要“三位一体”，然而，综合素质评价，说到底，在只看分数不看人的录取制度中，只是一个噱头。

教育要进步，必须有实质性的改革作为。但遗憾的是，动人的教育改革口号振奋人心，但动真格、实质性的教改在2014年还很少。改革多在原地打转，而教育的老大难问题，只是换一个时间、地点，一次次重演。校车又出事故，教师又停课讨薪，老师性侵学生，学生暴力伤害老师，择校变为择学区，学区房价格飙升，高校又出学术腐败，学生作弊从国内走向国外……媒体一次次要我解读这些新闻，我只能搬出10年前就说过的话，再说一遍。过时的观念一再借现实的问题“新生”，这是何等的令人沮丧。而更令人困惑的是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，国家早已找到，并写进教改纲要，可是却迟迟不落实，或者在落实中变异。

我不希望我国的教育，一边高喊着振奋人心的改革口号，一边重复老的故事。为此，我期待2015年的中国教育改革能有所突破。

教育改革要有实质突破，教育要出现新气象，关键在于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，这需要真正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。2015年的中国教育，能有多大改变，取决于政府向学校放权，以及学校探索现代治理有多大力度。(著名教育学者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)

本人撰稿

我是楼宇烈 传统文化传播 更要起而行之

2014年，国家反腐取得了重大的业绩，对于老百姓来讲是欢欣鼓舞的事，证明我们党是为人民做主、为人民思考的，想人民之所想，这让我感到很高兴。

更高兴的是，在传统文化方面，我看到了很多进步。我相信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会越来越高、越来越绝。

自信要从传统上建立，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历史不认同、对我们的文化不认同，你能让他爱国吗？不可能的。他了解的都是西方的，肯定是爱他们的东西，所以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是我们的根本。只有认同了我们的文化传统，不会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全部是糟粕，不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，那你才会对我们的传统有所认同，才会有热爱，才会有自信。你不了解自己的文化，你了解的都是西方的文化，那不可能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。对我们的文化没自信，对我们的社会、国家也不会有自信。你不可能让他爱国，那太强求了。他爱，首先要了解对方。我们过去批判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不就是大家根本没有了解吗？那怎么有爱情啊？爱国也是一样。

我想我们在传统文化方面不光要宣传，更需要践行。比如说《弟子规》里讲“父母呼，应勿缓”。父母有事情才会叫你，你是不是应该回应一声呢？这个道理你光会背没用，在家里或者幼儿园里进行幼儿教育，告诉孩子们在家里如果爸爸妈妈叫你，你就应该答应，而且应该问他们有什么事，这样才有效。《弟子规》里告诉我们“出必告，返必面”。那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做到这一点，你出去的时候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到哪儿去了，这样父母就放心了，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们我回来了。都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要实行，落实不了就没有力量。这样去做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规范，改变家庭的气氛，改变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。

因此，我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播，不仅要坐而论道，更要起而行之。(著名国学家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)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



我是李银河 我是一条狗 就不能承认我是一只猫

我是李银河。虽然退休两年了，但是2014年我没闲着，真有点累了。

2014年，我有五本书与读者见面，有《性学入门》、《新中国性生活研究》，还有一套三册谈性的书。真没想到这是我人生中出书最多的一年。不过，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我退休之前写的。那本叫作《性学入门》的，起初是北京大学跟我约的，因为题材很敏感，十多年出不了，我一直郁结于心。后来，这本书改成今天这个名字出版了。

我想说啊，其实不是我写，而是时代变了。我觉得，整个社会在能否正视人性与欲望的问题上，中国才刚刚走出中世纪，但今天对于性，社会的尺度已经宽松多了。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同性婚姻，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得到了改善。

但正视和合理地追求人性仍是一场拉锯战。

十几年了，涉性的法律没有改，最需要改变的聚众淫乱罪，关于淫秽商品的法律，也没有松动的迹象。这些法律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没有的。我曾说性也是一种政治权利，现在看来，与其伸张权利，不如继续启蒙。我退休了，可能也继续闲不着。

有人说，“李银河就是因为搞同性恋把王小波气死的！”我对这种攻击已经习惯了。最近又有人拿这件事来攻击我，但这一次，我觉得是一个科普的契机。

以前人们知道什么是跨性别人群么？不知道。在中国，大部分人对于社会学方面的性别知识很缺乏，至于LGBT(编者注：LGBT指性学研究中的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跨性别者、双性恋)这个词更是闻所未闻，但是这个概念在西方已经很普及，甚至在美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观念了，如果奥巴马不搞清楚这个概念，连竞选都不能成功。

现在呢，至少关注媒体的人都知道什么是LGBT。我想补充的是，女同性恋的这个T不是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缩写，而是Tomboy，假小子的意思。有一些跨性别的人和同性恋中的T可能有一点重叠，就是程度不同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提LGBT，为什么要把这里的T提出来呢？他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，这两个群体还是有区别的。

现在可好了，我牺牲一下我的隐私，就让大家知道了一个性学名词，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，多好。

假如时代继续改变，我会继续写我的虐恋小说，虽然我的文笔不好，这个题材现在也没有单位敢给我发表，但我相信总会有这么一天。

那些关于性方面的法律，我还是希望改一改，虽然这很难做到。

但还是有人去呼吁，毕竟如果我是一条狗，我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一只猫，因为这是不诚实的。(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，性学专家)

本报记者 张榕博 采访整理

我是熊丙奇，是一名教育学者。

对于过去的2014年，我首先向采访过我的一些记者表示歉意。“这个问题，我真不想再说了。”这恐怕是过去一年中，我对采访我的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甚至有时我会情绪激动，弄得记者莫名其妙，在此我要说，这不是我对他们有意见，而是我对中国教育问题老是这样反复上演，十分有意见，以至于愤怒。

2014年，中国教育有进步吗？从热闹的改革新闻报道看，似乎有很大的改革动静。

2015年，是北大、清华的综合改革元年，在2014年末发布的北大、清华改革，将从2015年启动。在启动改革之时，能否有去行政化的实质作为，关乎整个改革的走向和成败，这也将影响其他中国大学的改革。

2015年，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元年，高考将按3+3进行全新的科目组合。已经启动试点的上海，将推出新春考，这是我国内地高校首次尝试给一名考生发两张录取通知书，也是我认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之一。这一改革进展如何，将对我国高考招考分离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，希望上海能把这一改革做好。

2015年，还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、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启动之年，各地教育部门、学校，能否重视综合素质评价，认真推进课程建设、改革，可从中看到高考改革的成效。

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，我很难对其点赞。先于北大、清华，早有学校颁布章程，可章程颁布后，现实没有任何改变——没人真把章程当回事。我曾反复呼吁，要把章程制定纳入立法程序，可教育部门和高校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颁布章程，这样的章程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，如何能成为依法治校的宪章？

高考改革，被誉为最彻底、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。可美言者忘记了，过去20年来，我国一直在进行高考科目的调整，当年高考科目从6门变为3+x，力度并不比现在小，可结果如何呢？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？应试教育缓解了没？再看录取制度，多年前就有省市推出综合素质评价，号称在录取时要“三位一体”，然而，综合素质评价，说到底，在只看分数不看人的录取制度中，只是一个噱头。

教育要进步，必须有实质性的改革作为。但遗憾的是，动人的教育改革口号振奋人心，但动真格、实质性的教改在2014年还很少。改革多在原地打转，而教育的老大难问题，只是换一个时间、地点，一次次重演。校车又出事故，教师又停课讨薪，老师性侵学生，学生暴力伤害老师，择校变为择学区，学区房价格飙升，高校又出学术腐败，学生作弊从国内走向国外……媒体一次次要我解读这些新闻，我只能搬出10年前就说过的话，再说一遍。过时的观念一再借现实的问题“新生”，这是何等的令人沮丧。而更令人困惑的是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，国家早已找到，并写进教改纲要，可是却迟迟不落实，或者在落实中变异。

我不希望我国的教育，一边高喊着振奋人心的改革口号，一边重复老的故事。为此，我期待2015年的中国教育改革能有所突破。

教育改革要有实质突破，教育要出现新气象，关键在于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，这需要真正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。2015年的中国教育，能有多大改变，取决于政府向学校放权，以及学校探索现代治理有多大力度。(著名教育学者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)

本人撰稿